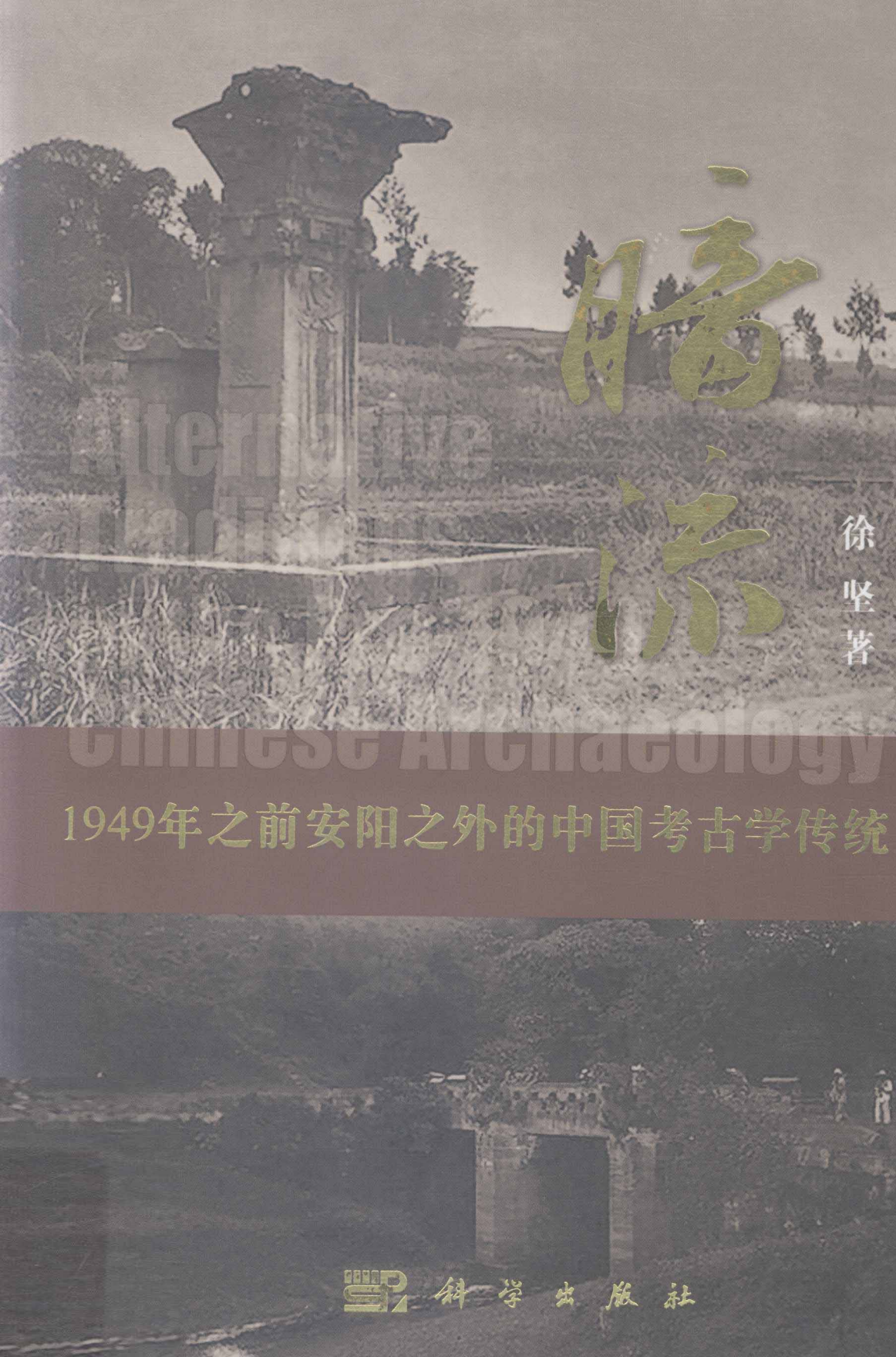




暗流

徐坚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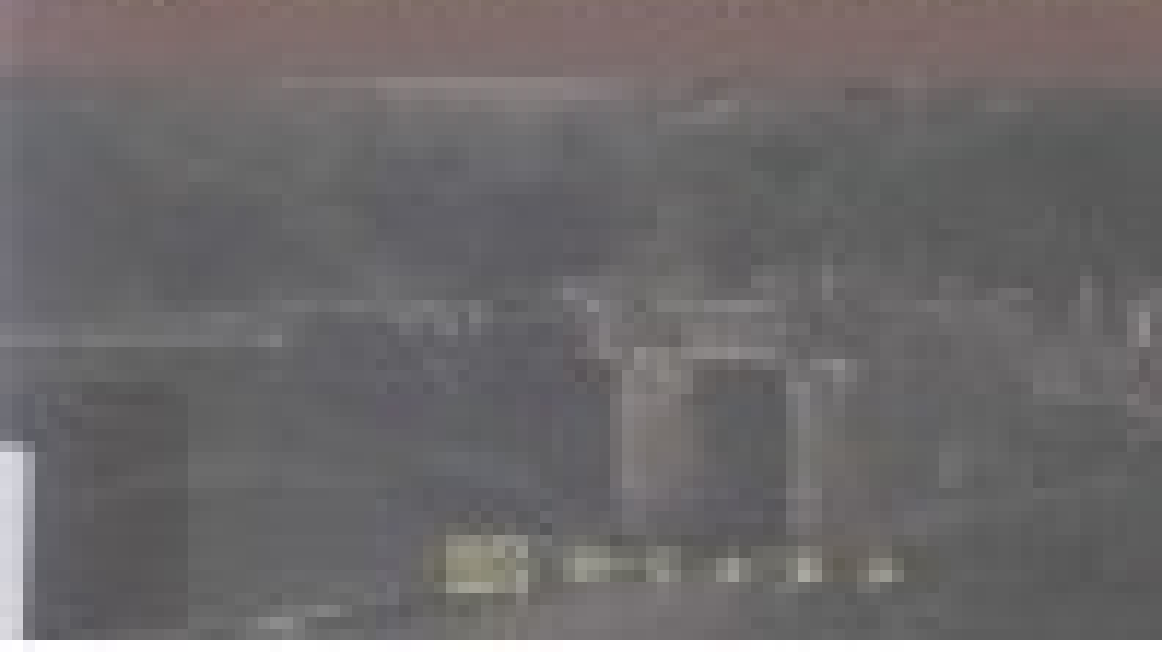
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



科学出版社



1949年以前，中国农村的农业生产水平很低，农民生活非常贫困。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土地改革、兴修水利、推广农业技术等，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这一时期，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中山大学“985 工程”资助

暗流

1949 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

Alternative Traditions in the Pre-1949 Chinese Archaeology

徐 坚◎著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暗流: 1949 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 / 徐坚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2. 2

ISBN 978-7-03-033469-5

I. ①暗… II. ①徐… III. ①考古学史—中国 IV. ①K87-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6963 号

责任编辑 闫向东 樊 鑫

责任校对 邹慧卿

责任印制 赵德静

封面设计 谭 硕

出版发行 **科学出版社**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网 址 <http://www.sciencep.com>

印 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一版 2012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 × 1000 毫米 B5

印 张 28

字 数 557 000

定 价 6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绪 论	暗流：超越安阳	001
第一章	平行的安阳：以《邺中片羽》和《河南安阳遗宝》为例	028
第二章	安阳之外：从浚县辛村到苍洱之间	059
第三章	众流：多元化的考古学群体	100
第四章	挖掘乡土：朱提堂狼洗、梁堆和张希鲁	172
第五章	走向民族考古学：以前范式时代的铜鼓研究为中心	199
第六章	新郑李家楼：从盗宝私藏到学术公器	239
第七章	复原之术：基于古董市场重建的考古学	274
第八章	从蛮洞到崖墓：多线式研究的范例	339
第九章	静水深流：考古学概念、方法和理论入华	368
余 论	作为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暗流视角	396

绪论

暗流：超越安阳

在中国考古学，尤其是1949年之前的中国考古学中，安阳拥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新生的中国考古学以安阳作为起点并非偶然，不过，安阳在1949年之前的中国考古学中形成一枝独大的局面却是始料不及的。具有近现代意义的考古学理念自19世纪晚期起零星地进入中国，但直到新文化运动时期之后才形成整体性学科规模〔1〕。尽管选用标准不一，但是诸家都将中国考古学的诞生推定在20世纪20年代〔2〕。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下文分别简称中研院和史语所）于广州东山成立，初设九组，后合并成历史、语言和考古三组〔3〕。

〔1〕 夏鼐：《五四运动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考古》1979年第3期。

〔2〕 在具有近现代意义的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年代上，诸家在选择中国考古学出现的标志性事件和活动的选定上存在分歧。有以中国境内第一次科学意义的考古学发掘，即1921年安特生（J. G. Andersson）主持的河南渑池仰韶发掘为标准；有以中国学人主持的第一次考古学实践，即李济1926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调查和发掘为标准；有的以国家考古学研究机构的成立，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和安阳发掘工作的展开为标准。虽然存在争议，但是诸家之说都未违背“田野考古”的定义。

〔3〕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傅斯年最初设想为九组，按照历史和语言两个方面进行分类，前者包括文籍考订、史料征集、考古、人类及民物、比较艺术五个类别，后者包括汉语、西南语、中央亚细亚语和语言学四个类别。后实施时设立史料、汉语、文籍考订、民间文艺、汉字、考古、人类及民物学、敦煌材料研究八组。1934年5月增设人类学组。

由于创始学人深受德国兰克史学的影响，史语所从创办之初起即强调“求新材料”是其首要任务〔4〕。傅斯年（1896~1950）开宗明义地表达了史语所的学术目标在于“我们很想借几个不陈的工具，处治些新获见的材料”，而考古是发现新材料的最显而易见的途径。他进而勾勒了寻找新材料的两条线路，即京汉路的安阳到易州一段和自洛阳逐步西向至中亚〔5〕。国家主持的考古学实践初试啼声，虽然存在若干选择，但是无论在理论预设，还是前期基础和工作便利上，安阳都远优于其他〔6〕。如果以史语所的成立和史语所主导的安阳发掘的展开为中国考古学的起点尚存在争议的话，毋庸置疑的是，史语所在中国考古学随后二十年的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无出其右。自1928年起，安阳的发掘先后由董作宾（1895~1963）、李济（1896~1979）和梁思永（1904~1954）等主持，虽时有波折，但一直到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安阳发掘才被迫中止。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安阳的发掘也未能及时恢复，直到195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才重返安阳〔7〕。战前安阳发掘共计15季，年代跨度几近十年。史语所考古组发掘了小屯北地、侯家庄、西北冈、后冈、大司空村等多个地点，先后揭示出晚商宫殿、作坊、陵墓等重要考古学遗迹和包含甲骨、青铜器、玉器、陶器在内种类众多、数量庞大的遗物。安阳发掘的最直接的贡献是证实了晚商的存在。这种“证实”对于中国上古史，尤其是在疑古思潮冲击下亟待重建的古史体系至关重要。虽然安阳的发掘并不能和《史记·殷本纪》完全对应，但是古史体系

〔4〕 Ranke L von, Iggers G G, et al.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73; Iggers G G, Powerll J. *Leopold von Ranke and the Shaping of the Historical Discipline*.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0; Iggers G.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Hanover: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7. 中译本见何兆武译：《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

〔5〕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6〕 陈星灿：《中国考古向何处去——张光直先生访谈录》，《华夏考古》1996年第1期。

〔7〕 郭宝钧：《1950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5册，1951年。

急不可待地征引了安阳发掘，并且轻率地扩大了安阳“证实”的范畴〔8〕。对于中国考古学而言，它无疑强化了编史倾向，历史考古学的影响尤为明显。但是，安阳对于中国考古学的更重要的价值表现在学科特征的塑造上。安阳的发掘延续时间长，频率高，不仅在1949年之前的考古学中无任何其他单个遗址可以企及，就是直到晚近也罕有可以与之匹敌的个案。在安阳正式发掘之初，中国考古学几乎没有任何可资征引的田野发掘经验。因此，在中国考古学的田野经验和方法积累上，安阳具有不可辩驳的奠基之功。安阳培育了中国考古学的区域性历史知识，即如何辨认地层、墓葬、建筑等遗迹单位，如何发掘，如何对器物进行描述和分类，如何实现考古学器物组合和文化与上古史重建的结合。安阳小屯及其周边遗址面积巨大，遗迹和遗物类型多样，这是此前发掘的其他遗址无可比拟的。无论是墓葬和房址的发掘，还是器物类型区分，中国考古学在随后数十年的工作思路都可以在安阳找到早期线索。在中国考古学学术力量的建设上，安阳发掘聚集了1949年之前绝大部分专业力量，因此对于中国本土考古学家的培养，以及他们之后的学术倾向都有重要的影响。从学术背景上看，中国考古学第一代学人中除梁思永之外，其余诸家都是出自西方人类学或者本土历史学和文字学背景；在发掘安阳之前，有实际田野工作经历的中国考古学人仅有李济和梁思永〔9〕，但是，他们的发掘经验在地域和遗址类型上都极受局限，因此大多考古学家是在安阳开始逐步掌握中国考古学的具体遗物类型和遗迹现象。而且，由于安阳是战前硕果仅存的长期发掘的遗址，成长中的中国考古学第二代学人几乎悉数受益于安阳的发掘。从任何角度判断，战前的安阳都是早期中国考古学的大本营。

但是，安阳并非1949年之前中国考古学的全部。虽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甫一成立就开赴安阳，恢复发掘，在随后的半个世纪中安阳重要的发现也层出不穷，但是，其在中国考古学中的比重已经显著降低〔10〕。如果超越安阳单一

〔8〕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1925年清华大学油印讲义，1994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影印本，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2页。

〔9〕 李济：《西阴村史前遗存》，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三种，1927年；梁思永：《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1930年单行本。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

遗址，重新观察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大陆地区考古学布局，我们即可明确地感受到中国考古学范式的变迁^{〔11〕}。不同理论立场的考古学与现实政治的亲疏程度不一，其中国族主义考古学与政治格局的变迁最为契合^{〔12〕}。直到 80 年代中期之前，中国考古学仍然处在分类—历史范式之下，尤其容易受到社会情境的影响，也更倾向于与国族主义思潮结合^{〔13〕}。1949 年之后，参与安阳发掘和研究的大部分学人随同史语所及安阳遗物迁台。新建的大陆地区考古学传统对变革的强调，远较继承强烈得多。安阳传统此时已经转为“暗流”，直到非常晚近的时代才重新得到认可^{〔14〕}。中国考古学在 50 年代明显受到苏维埃考古学传统的影响，不过尚不可解释自 50 年代起中国考古学“遗产”的全部组成成分。新生的国家考古学机构几乎尽可能地吸纳了多个来源的学术力量^{〔15〕}。大部分省区都开始组织自身的考古学发掘和研究活动，除了北京大学和考古工作人员培训班培养了大批考古工作者之外，各地也在改造和吸纳众多 1949 年之前就参与考古活动的人员。这导致 50 年代的中国考古学看起来更加多元。至少在考古学从业人员、考古学方法上，存在着众多来自安阳之外的知识和技术。而在阐释

〔11〕 夏鼐：《建国十年来的中国考古新发现》，《考古》1959 年第 10 期；夏鼐：《新中国的考古学》，《考古》1962 年第 9 期。

〔12〕 Trigger B. Alternative Archaeologies: Nationalist, Colonialist, Imperialist. *Man*, 1984, (19): 355-370.

〔13〕 Kohl P L, Fawcett C. *Nationalism, Politics and the Practices of Archa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Nationalism 一词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国族主义”多种汉译方式，为避免歧义，本书统一采纳“国族主义”。

〔14〕 迟至 20 世纪 70~80 年代，夏鼐著文之中仍不便提及傅斯年和李济。在其《五四运动与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中，傅斯年的贡献被计在蔡元培名下，而李济以“年轻而具有一定的近代考古学知识和发掘经验的归国留学生”匿名出现。李济的论文《中国古代文明》迟至 1996 年才出现在《考古》杂志第 8 期上，由于该文以英文写作于 1960 年，《考古》发表此文显然纪念意义重于实际意义，这也是中国考古学重新承认安阳传统的信号。

〔15〕 以《中国考古学报》编辑委员会为例，1948 年第 4 册时以李济为总编辑，编辑包括傅斯年、董作宾、徐中舒、梁思永、郭宝钧、石璋如、夏鼐和高去寻；1951 年出版的第 5 册即更改为以郑振铎为主任委员，梁思永为常务委员，委员包括夏鼐、郭宝钧、黄文弼和苏秉琦。

理论上，流露出诸多既非出自安阳，也非受到苏维埃考古学影响的特质。这些传统在此前尚未得到充分的讨论，尤其没有在考古学学科建构的意义上予以评估。舍弃对这些部分的考察，我们将无法理解时至今日的中国考古学中仍可体察的独特传统的来源，抹杀中国考古学的多样性特质。

1.1 安阳传统

安阳位于豫北平原上，洹水穿行而过，洹水两岸即是商代晚期都城“大邑商”的遗址所在地，覆盖今天的小屯村、大司空村、小司空村、武官村、后冈、花园庄、西北冈、梅园庄、孝民屯、侯家庄、范家庄和北辛庄一带。虽然《史记》诸篇两次提及殷墟，但是至少在 20 世纪之前并没有引起学者们的足够注意；隋墓填土之中频见甲骨碎片，也未引起任何严肃的学术研究^{〔16〕}。19 世纪晚期，安阳小屯村民即已在地中掘出甲骨，起初作为刀尖药出售给药铺，到世纪之交时，甲骨成为古董市场上金石收藏扩大化潮流中新辟的一个类别。掘地获取甲骨成为安阳一带农民在农闲季节的主要营生活动。不过，学术意义上的甲骨发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相对漫长的时期。自 1903 年刘鹗《铁云藏龟》起，经 1904 年孙诒让《契文举例》刊布，到 1912 年罗振玉《殷墟书契前编》出版，方才确认甲骨的史学价值^{〔17〕}。以罗振玉和王国维为代表的学者的甲骨文研究将安阳小屯及周边地区和晚商史联系在一起，但在甲骨之外，无论是学者还是古董商人对商代安阳的其他侧面知之甚少，也评估不足，甚至认为“宝藏一空”的安阳几无“考古”价值。

1928 年成立的中国最高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即选择此地作为考古组的重要基地。安阳是史语所 1949 年之前考古发掘的唯一重心，也是中国考古学诞生最初三十年中，有组织、有计划的考古学研究进程的最好例证。在安阳之外，并非没有其他遗址可替代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基石。至少安特

〔16〕《史记·项羽本纪》：“洹水南殷墟上。”《卫康叔世家》：“河淇间，故商墟。”关于安阳隋墓的发现，参见 Li C. *Anyang*. Seattle: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1 年第 3 期。

〔17〕徐坚：《发现甲骨：考古学史的视角和写法》，《华夏考古》待刊稿。

生已经在 1921 年发掘了新石器时代遗址仰韶和旧石器时代遗址周口店^[18]。后来主持殷墟发掘的李济也于 1927 年发掘了西阴村^[19]。但是，安阳并不是偶然选择的结果。相对于石器时代遗址，具有实证史学倾向和国族主义倾向的考古学都更乐于选择早期历史阶段或者原史阶段的遗址，因为后者直接关涉到国家和文明起源等问题。而另一方面，虽然田野考古学观念已经零星入华，但是如何具体在中国完成自调查、发掘到整理的过程，几乎无人拥有经验。中国考古学几乎无力另辟全新的发掘地点，只能在既往有出土记录的地点中选择。而且从史料学角度出发，选择有晚期文献支撑的原史遗址也较史前遗址更为稳妥。傅斯年大致划定了史语所最初考古工作的范围，其中安阳无疑是最具可能性的候选地点。

史语所对安阳的预期与传统学术有别。安阳布局之前，传言多认为安阳已经发掘殆尽，但傅斯年对安阳发掘的成果持乐观态度，尽管其判断基于何种事实基础和理论假设已无从求证，“安阳殷墟以前盗出之物并非彻底发掘，……这些地方我们既颇知其富有，又容易达到的，现在已着手调查及布置，河南军事少静止，便结队前去”^[20]。此论作于 1928 年 5 月。嗣后不久，即 1928 年 8 月，史语所编辑员董作宾被派往安阳小屯调查。董作宾系河南南阳人，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生毕业后短暂任教于中山大学，旋转入史语所。自安阳发掘起，董作宾毕生以安阳甲骨为主要研究范畴，是甲骨学研究成果最丰硕的学人之一。在洹水一带调查之后，他坚称此地并非如同罗振玉所断言的发掘殆尽。“吾人可由此次调查而知者，为甲骨挖掘之确犹未尽”，吁请中研院迅即展开发掘^[21]。此论也微妙地透露出，董作宾在学科定位和研究取向上更接近罗王之学，仍然以甲骨为安阳发掘的追求目标，并非傅斯年期盼的田野考古的最佳人选。

安阳发掘就是在发掘初衷与新史学理念略有违离的情况下展开的。为了顺利进行发掘，中央研究院和河南省政府联合组成发掘机构“中央研究院掘地层委

[18] 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北京：农商部地质调查所，1923 年。

[19] 李济：《西阴村史前遗存》，《李济文集》第 2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

[20]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 3 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年。

[21] 董作宾：《民国十七年十月试掘安阳小屯报告》，《安阳发掘报告》第 1 期，1929 年。

员会”，设址于洹上村的彰德高级中学。这种院省合作模式嗣后成为史语所在河南、山东乃至西南开展发掘的主要方式。发掘由董作宾总揽其事，主要参与者还有代表河南省政府的张锡晋和郭宝钧（1893~1971）。发掘自1928年10月13日开始，以小屯为主要发掘地点，工人分成三组分别在洹水沙丘、村北和村中三处发掘。当时所用方法称之为“轮廓求法”和“集中求法”。所谓轮廓求法即在假定的遗址四周发掘，寻找边界，然后逐步内聚。而集中求法则是在中心地带的发掘。两种方法的来源均无所知，此前亦无先例可循。如果与嗣后其他遗址的考古发掘方法结合起来考虑的话，发掘方法可能多出自郭宝钧之设计。不过，无论是“轮廓求法”还是“集中求法”，董作宾的着眼点均在找寻甲骨上。如果以对安阳晚商遗迹现象的现代认识进行判断的话，安阳第一季发掘已经揭露出各种遗迹现象，不过发掘者可能并无意识。未见甲骨之时，董作宾失望之情溢于言表，但是傅斯年显然有不同认识，“我等此次工作目的，求文字其次，求得地下知识其上也”〔22〕。不过最终如董作宾所期待，为期17天的首季发掘出土甲骨854片，另有铜器、陶器、骨器、蚌器及玉石器等〔23〕。但是，发掘方法不乏值得检讨之处，李济后来评论，“此次董君挖掘仍袭古董商陈法。就地掘坑，直贯而下；唯检有字甲骨保留，其余皆视为副品。虽绘地图，亦太简略；且地层紊乱，一无记载”〔24〕。

自第二季发掘起，傅斯年作出调整，发掘组织更名为“国立中央研究院河南殷墟发掘团”，改委甫加入史语所的李济主持安阳发掘，在安阳传统上标志了田野原则和方法的全盘变更。李济提出了“科学”的考古的观念，“科学的考古必须具有五项条件：一是必须有问题，二是必须有方法，三是记载必须精确，四是必须无成见，五是必须有耐心”〔25〕。此次发掘也开始明确规定测绘和地层记录方法。不过，李济并非考古学出身，而且在中国，更早的考古发掘仅有屈指可数的几次，在方法论上几乎无一可资借鉴。第二季发掘自1929年3月开

〔22〕 史语所档案，元字第23号。

〔23〕 董作宾：《民国十七年十月试掘安阳小屯报告》，《安阳发掘报告》第1期，1929年。

〔24〕 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02页。

〔25〕 史语所档案，元字第25号之6。

始，到5月结束。此次发掘明确采取了探方法，但是布方太过分散，3米×1.5米的探坑多达43个，散布在村北、村中和村南。出土遗物包括甲骨、陶器、兽骨、蚌片等，虽李济不再以甲骨为发掘目的，但是此次发现的甲骨尤其丰富，达740片之多〔26〕。当年10月，《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出版，汇报了前两季发掘的成果。

1929年秋天，第三季发掘开始。但是，开始不久即受到何日章、关百益等地方势力的抵制，尽管蔡元培和傅斯年多方斡旋，但收效甚微。蔡元培称“除向南京政府设法外，亦一筹莫展。恐安阳已为何日章等之舞台，无可挽救”〔27〕。恢复后的发掘分为两次，分别在10月7~21日和11月15日~12月12日进行。发掘方法上，探沟法替代探坑法用于揭示密集的中小墓葬。村北探沟长达30余米，共揭示出24座墓葬，而甲骨数量较前期更是猛增，多达3000片，其中包括著名的大龟四版和牛头刻辞。李济推测，“殷墟的范围，实超出小屯村境界以外”。李济在田野之中发现一片彩陶，据此写成《小屯与仰韶》一文，提出仰韶远远早于小屯，两者之间没有亲缘关系〔28〕。这是中国考古学中“相对年代”观念的最早出现。在同一年，李济还发现了一座俯身葬墓葬，构成《安阳发掘报告》第3期《俯身葬》一文〔29〕。董作宾则在1931年发表了《大龟四版考释》，提出了“贞人集团说”〔30〕。

1931年3月，中原大战平息之后，史语所重返安阳，组建“中央研究院安阳殷墟发掘团”，由李济总掌其事，发掘团队规模扩大，可以同时安排多个地点的发掘。发掘方法上多采用10米×10米的大探方，以被称为“卷地毯”的大面积揭露方法替代探坑或者探沟法。小屯村北已经分成多个区域，分别由梁思永、郭宝钧和董作宾等负责，村外的四盘磨遗址的发掘由吴金鼎和李光宇负责，而后冈的发掘则由梁思永负责。此次发掘的后冈被嗣后的考古学史赋予了划时代价值。梁思永第一次在地层上证明小屯、龙山和仰韶的关系。这组地层关系

〔26〕 李济：《小屯地下面情形分析初步》，《安阳发掘报告》第1期，1929年。

〔27〕 潘光哲：《蔡元培与史语所》，《新学术之路》，台北：“中央”研究院，1998年。

〔28〕 李济：《小屯与仰韶》，《安阳发掘报告》第2期，1930年。

〔29〕 李济：《俯身葬》，《安阳发掘报告》第3期，1931年。

〔30〕 董作宾：《大龟四版考释》，《安阳发掘报告》第3期，1931年。

虽然屡屡见于安阳其他地点，但最终以“后冈三叠层”命名^[31]。很多学者视其为中国考古学中地层学成熟的标志^[32]。

同年秋天，安阳开始了董作宾主持的第五季发掘。此次发掘集中在小屯村北和后冈两处。前处的发掘者包括董作宾、郭宝钧和石璋如（1902~2004），后处的发掘者则有梁思永和刘耀（1906~1983）。由于春季揭示出地层叠压关系，秋季发掘之时，安阳发掘在地层学上明显成熟起来。小屯新增 F 发掘区，出土甲骨多达 381 片；后冈则发掘出龙山时期的房屋地面和夯土围墙。

次年春天，李济主持了安阳第六季发掘。除继续发掘小屯村之外，新增高井台子和王裕口两处发掘地点。董作宾、刘屿霞、石璋如、李光宇等发掘的小屯中出现台基版筑建筑，这是小屯最早确定的宫殿遗迹。而在高井台子遗址，吴金鼎和王湘的发掘再度证实了“后冈三叠层”现象^[33]。

1932 年 10 月，安阳第七季发掘开始，仍由李济主持。发掘集中在小屯北地，方法上也一如既往地采用探坑发掘法。此次发掘揭示出小屯北地所出商代宫殿建筑并非孤立的建筑，而是连片成组。发掘者因而推断，这里可能是殷商时期的宗庙建筑^[34]。

1933 年秋季，史语所开始在此地的第八季发掘。发掘地点包括小屯、四盘磨和后冈。此次发掘持续到当年冬季，在后冈甚至一直持续到 1934 年 1 月。刘耀、石璋如、李景聃和尹焕章主持了此地的发掘，他们在后冈发现了一座“中”字形大墓，大墓四隅有多达 28 个殉葬人头，这是首度揭示的殷商殉人遗

[31] 梁思永：《后冈发掘小记》，《安阳发掘报告》第 4 期，1932 年；梁思永：《小屯、龙山与仰韶》，《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南京：中央研究院，1935 年。

[32] 尹达：《悼念梁思永先生》，《文物参考资料》1954 年第 4 期；张忠培：《梁思永先生与中国现代考古学——纪念安阳后冈遗址发掘 50 周年》，《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年；张爱冰：《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先生访谈录》，《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尹达仅简要提及后冈发掘，也未曾以后冈三叠层作为中国考古地层学成熟的标志。后冈的学术史价值可能是晚至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追认的结果。

[33] 吴金鼎：《摘记小屯迤西之三处小发掘》，《安阳发掘报告》第 4 期，1932 年。

[34] 石璋如：《殷墟最近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中国考古学报》第 2 册，1947 年。

迹^[35]。后冈大墓的发现鼓励安阳考古学家们把寻找殷商大墓乃至王陵的计划付诸实现。

1934年春季,安阳的发掘进入到第九季。此季发掘除了延续在小屯村北和后冈的工作之外,发掘范围扩大到侯家庄南地。董作宾意外得知,在史语所发掘小屯的同时,侯家庄的村民一直在村南继续盗掘甲骨。在制止盗掘之后,史语所于1934年4~5月进驻此地发掘。通过开探沟的形式,发现夯土基址2处,窖穴15个,墓葬19座,所出甲骨尤以大龟七版为重。

1934年秋天为安阳第十季发掘。自此季开始,一直到1935年冬天第十二季发掘结束,虽然每季同时发掘多个地点,但是西北冈王陵区一直是此三季的发掘重点,而主持人则由梁思永担任。第十季发掘有石璋如、刘耀、祁延霈、尹焕章、胡厚宣等,在西北冈西区发掘了M1001、M1002、M1003和M1004号大墓。这些大墓皆采用四出之形,当属地位最为崇高的墓葬,西北冈也被厘定为殷王陵区。

第十季发掘在1935年春季,自3月到6月。除第十季已经参加的考古学人外,即将赴英留学的夏鼐(1910~1985)也加入到西北冈的发掘队伍之中。除了继续发掘第十季已发现的大墓之外,此次发掘主要在东区清理了超过400座小墓和祭祀坑。

第十二季发掘在1935年秋季,9月初动工,持续到12月中期。这是西北冈王陵区规模最大的一次发掘。参加者计有石璋如、刘耀、李景聃、祁延霈、李光宇、高去寻、尹焕章、潘镠等。此次发掘不仅在西区新增了三座带四出墓道的大墓M1217、M1500和M1550,假大墓M1567,在东区也发现了四出墓道大墓M1400和“中”字形大墓M1443和M1129^[36]。同时期在范家庄和大司空村也有发掘。

1936年春季,第十三季发掘开始,由郭宝钧主持。发掘的重点在小屯村北,此次采用被称为“平翻法”的探方法发掘,发掘面积显著增加。在小屯B、C两区,布10米×10米探方多达47个。发现夯土台基4处,墓葬181

[35] 石璋如:《河南安阳后冈的殷墓》,《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3本,1948年。

[36] 高去寻:《殷代大墓的墓室及其涵义之推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9本,1969年。

座。其中灰坑 H127 出土甲骨 17096 片〔37〕。

1936 年秋季为第十四季发掘，由梁思永主持。发掘地点集中在小屯村北 C、I 两区，探方开方数多达 60 个，发掘面积近 4000 平方米。发现夯土基址 26 处，墓葬逾百座。高去寻主持了大司空村发掘，此地仍以探坑法开探坑 63 个，发掘面积 1100 平方米，清理了近百座殷商和战国时代小墓。

1937 年春季为第十五季发掘，由石璋如主持，发掘集中在小屯村北 C 区。此地沿用自十三季时采用的探方法，开方 37 个，发掘面积达到 3700 平方米。发现夯土台基 20 处，出土 599 片甲骨及铜器、玉器和白陶等。

除受战争和政争影响外，史语所坚持每年春秋两度发掘安阳，持续近十年。诸多前辈学人曾对安阳发掘进行分期，试图揭示其中的阶段性变迁。梅原末治依据发掘经费的来源，将史语所的安阳发掘分成三期：其中董作宾的预先调查和前两季发掘为第一期，此时的发掘以史语所和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合作项目名义进行，经费概出自美方，至中研院和河南省政府冲突，中止与弗利尔美术馆合作为终结；第二期自 1931 年春天开始，至 1932 年秋第七季发掘结束为止，此时的发掘主要依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支持；第三期自 1933 年秋季开始，直到第十五季发掘，安阳发掘改由政府全额支持〔38〕。发掘经费来源的变迁的确会影响到发掘目的和策略，但是否达到具有分期的价值尚未易遽断。杨宝成基于发掘内容的变迁，更直观地将安阳发掘分成三个阶段：其中第一季到第九季发掘为第一阶段，第十季到第十二季发掘为第二阶段，第十三季到第十五季为第三阶段〔39〕。如果从田野考古学方法和认识的角度看，杨宝成分期方案可能更为可取，但仍有必要作出适当调整：董作宾主持的第一季发掘为第一阶段，发掘以搜寻甲骨为主要诉求，田野考古意识尚很薄弱；李济主持的第二季到第九季以安阳的建筑遗迹为主要发掘范畴，总结出基本发掘规程，积累了辨识中国考古学特有的遗迹现象的经验，构成了第二个阶段；1934 年第十季开始，以梁思永主持的西北冈王陵的

〔37〕 石璋如：《殷墟最近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中国考古学报》第 2 册，1947 年。

〔38〕 梅原末治：《河南安阳遗宝》，京都：小林写真制版部，1940 年，第 5～8 页。

〔3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 年，第 8 页。

发掘为标志，安阳的田野考古走向成熟而形成第三个阶段。

战后，史语所再未返回过安阳，政治时局造成的影响是考古学人始料不及的，而长达十年的安阳发掘出土资料的整理和发表尚需等待更长的时间。安阳田野发现的刊布起始于1929年起出版的《安阳发掘报告》，共计出版四期，主要覆盖前七季的发掘收获。1947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报》也登载了安阳第八季到十五季的部分报告。虽然安阳发掘简报相对及时地刊布出来，但是无论是王陵还是遗址，完整的发掘资料都晚至60年代之后才陆续出版。西北冈王陵的发掘报告起始于由梁思永编辑的《侯家庄西北冈墓葬发掘报告》，梁思永去世之后，主要由高去寻负责辑补，自1962年《1001号大墓》出版以来，一直持续到1976年才全部出版完毕^[40]。石璋如负责小屯北地田野报告的编辑，约在1976年完整出版小屯遗址部分报告^[41]。建立在出土资料基础之上的研究在发掘过程中即已展开，但以分类方案和器物研究为主，重要的成果多在战后完成，包括李

[40]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台北：“中央”研究院，1962年；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三本·1002号大墓》，台北：“中央”研究院，1965年；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四本·1003号大墓》，台北：“中央”研究院，1967年；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六本·1217号大墓》，台北：“中央”研究院，1968年；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五本·1004号大墓》，台北：“中央”研究院，1970年；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七本·1500号大墓》，台北：“中央”研究院，1974年；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八本·1550号大墓》，台北：“中央”研究院，1976年。

[41] 石璋如：《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乙编·殷墟建筑遗存》，台北：“中央”研究院，1959年；石璋如：《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墟墓葬之一，北组墓葬》，台北：“中央”研究院，1970年；石璋如：《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墟墓葬之二，中组墓葬》，台北：“中央”研究院，1971年；石璋如：《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墟墓葬之三，南组墓葬附北组墓补遗》，台北：“中央”研究院，1973年；石璋如：《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墟墓葬之四，乙区基址上下的墓葬》，台北：“中央”研究院，1976年。